

一、近期中共人事異動簡析

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黃信豪主稿

- 疫情因素引發一系列中央、地方正省部級人事調動。從國務院部委首長、地方省委書記年齡來看，中共的任職年齡紅線應有彈性。
- 中共官場總計已有近 40 人「70 後」的副部級官員，若習近平尋求第三任、第四任，這些幹部或為習交班對象。
- 近期人事晉升亮點為「政法系統」、「東部省分」工作經驗與「金融背景」，這些特點也展現高層任命幹部可能關注的工作重點。

（一）前言

2020 年 1 月以來，影響中共人事異動最重要的因素無非是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。就連通常在 3 月召開的全國「兩會」，也因疫情因素延後至 5 月下旬召開。按照往例，每年「兩會」前後會有一波人事調動。本文將從三方面來簡析近期中共人事異動，第一說明疫情帶來的人事調動；第二討論近期人事異動中的年齡因素；最後探討人事任命的背景特徵與工作經驗。

（二）疫情帶來的人事調動

1 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從湖北蔓延全中國，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、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因被輿論指責應對疫情不利被免職。疫情因素引發一系列中央、地方正省部級人事調動。首先，旗幟鮮明的習人馬上海市長應勇接任湖北省委書記、上海市長空缺由山東省長龔正代理。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傑則從中央轉調山東省長，原新疆建設兵團黨委書記孫金龍則是上調中央，接任生態環境部黨組書記，生環部部長由原副部長、民主黨派人士黃潤秋出任，他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三位非中共黨籍國務院組成部門正職負責人。

除生態環境部外，司法部長傅政華也已到達退休年齡紅線，由遼寧省長唐一軍接任。擔任國家信訪局長長達 7 年的舒曉琴也轉任政協，原職由國安部政治部主任李文章接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從 2015 年

至今，李文章 5 年已轉任 4 個職務，換崗速度相當快，他是否為中央有意栽培，值得後續關注。

除這三個部門外，當前的國務院部門亦有數個部門領導人已到退休年齡。但在此之前，亦由部委首長即使到達退休年齡（特別是專業官員），也任滿 5 年才卸任的前例。顯然地，中共的任職年齡紅線，也有其靈活的一面（按 2014 年「黨政領導幹部退休年齡規定」，省部級黨政正職是 65 歲，但任期未滿的可延期 3 年）。

（三）年齡的彈性與部署

長期以來，過去中共的人事甄補存在「年齡劃線」的硬條件。也因為這項明確的規範，「年齡優勢」在過去中共官場上也相當被重視：某一幹部若能愈年輕時晉升到某一層級（如副部級），則表示他有更充分的時間累積政治資本與工作經驗，對他未來仕途發展愈有幫助。然而，2012 年習近平上任以來，這項幹部晉升的年齡優勢，或因習以打腐之名重整中共領導階層，而產生系統性的變化。近期的人事異動，也可以看到更多年齡劃線的彈性，以及「70 後」新一代幹部的部署。

首先，在年齡劃線下，在人事穩定的考量下接近退休年齡的幹部理當不致出現大規模調動。如以地方首長來說，換屆時 62 歲可新任，63 歲可連任，通常超過 64 歲則不留任。然而，四中全會後一系列的人事異動卻不符合這樣的預期。例如，2019 年 10 月，即將年滿 65 歲的原內蒙古黨委書記李紀恒（1957/1）轉任民政部部長，其空缺亦由原寧夏區委書記石泰峰（1956/9）高齡調任。已滿 66 歲的駱惠寧（1954/10）離開山西省委書記，原先外界預計駱或將退到二線，但他卻在 2020 年 1 月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。超過 67 歲的夏寶龍（1952/12）在退出一線領導職務，出任政協副主席與秘書長 3 年後，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。這些人事調動，或許顯示中央人事佈局考量已不再「唯年齡論」，用人更有彈性。

其次，另一個與年齡有關人事異動的亮點是「70 後」官員的晉升。每年隨著地方「兩會」的召開，通常會出現一波人事更替。自 2020 年 3 月底以來，已有超過 10 位 1970 年後出生的幹部晉升到各省（市區）副省長，包括吳浩（江西）、賴蛟（寧夏）、周紅波（廣西）、劉小濤（浙

江)、任維(西藏)、李毅(黑龍江)、阿東(吉林)、楊志文(青海)、程曉波(甘肅)、楊晉柏(北京)、章曦(安徽)、劉江玉(河南)等。這些異動絕大多數來自外省或中央部門調動，表示由中央系統性部署。目前，31個省市區只有3個省份沒有出現70後副部級幹部。

至今，「70後」的副部級官員在中共官場上已近40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當前「70後」的幹部仍以1970年出生佔多數，且晉副部的時間大多在45歲上下。從年齡來看，他們的晉升並不算快。然而，若習近平未來在「二十大」後尋求第三任，甚至第四任期，則「70後」幹部有可能會是習交班的對象。未來這些幹部如何被鍛鍊、提拔，將是觀察中共人事運作的重點。

(四)「政法系統」、「東部省份」工作經驗與金融背景

在討論完年齡因素，本文最後聚焦在近期人事晉升的背景特徵與工作經驗上。首先，近期在人事調動中被外界認為仕途看好的官員，如尹宏(河南省長)、應勇(湖北省委書記)、以及龔正(上海市長)與李文章(國家信訪局長)等，都有「政法系統」工作經驗。在2019年推出「政法工作條例」後，習已完全掌控政法系統。重用政法工作經驗幹部，或許也凸顯「維穩」、「維安」仍是幹部任命首要之務。

其次，不約而同的，龔正、應勇都有長期的浙江工作經驗。過去外界多以與習的關係(如「之江新軍」)來理解習上台後，曾有浙江工作經驗而被重用的幹部。然而，龔正在浙江的工作時間是2008至2013年，與習並沒有直接的工作交集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，東部官員在復工復產的表現，顯現出這些長期在經濟發達省份工作官員的決斷力與執行力。以此，促進經濟發展經驗或許成為疫情後人事任命的另一個考量重點。

「金融背景」則是另一個亮點。近兩年晉升各地副省長的「70後」幹部，有數位來自國家部委、央企幹部，特別出身金融系統、大型國有銀行，因此外界對其也有「金融副省長」的稱號，例如黃志強到內蒙前曾在中行、中信集團多年，郭寧寧(福建)則是出身中行、農行，李波(重慶市)在人行工作前，更有數年海外金融法務工作資歷。這些金融背景幹部的任命，或許表示中央嘗試幫助地方處理債務風險、渡

過經濟結構轉型危機，另一方面也讓專業出身官僚有地方歷練機會。

（五）結語

對世界各國來說 2020 年可謂是不平靜、動盪的一年。隨著 5 月底全國「兩會」結束後，近期的中央、地方人事異動也暫告段落。除疫情影響近期一波人事調整外，近期的人事任命反映「年齡」紅線的彈性；而在習近平預期將有第三任期下，「70 後」官員的仕途發展將是未來中共人事觀察的重點。

大致來說，「政法系統」、「東部省份」工作經驗與「金融背景」是近期人事任命突顯的三大特點。而這些亮點，也分別展現高層任命幹部時所可能關注的工作重點：包括「維穩維安」、「促進經濟發展經驗」與「協助地方處理債務風險」等面向。